



TITLE:

"學術與地域、國家和社會的關係" 討論議題

AUTHOR(S):

中山, 大将

CITATION:

中山, 大将. "學術與地域、國家和社會的關係" 討論議題. 2015年度京都大学南京大学社会学人類学若手ワークショップ 東アジア若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ワークショップ報告論文集 2016: 191-194

ISSUE DATE:

2016-06-04

URL:

<http://hdl.handle.net/2433/215773>

RIGHT:

“學術與地域、國家和社會的關係”

討論議題

中山 大將 (NAKAYAMA Taisho) *

研究者應該與社會擁有怎樣的關係？這是一個超越時代及地域的普遍性問題，也是我們年輕研究者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此次，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希望來自不同研究領域，使用不同語言的年輕研究者能夠一起進行探討。對於參與討論的同學，我會事先傳達自己的問題意識，對此希望諸位提出自己的看法，並於論壇開始之前發給我們。論壇當天，我們會請各位先將自己的看法進行朗讀，在與會場的其他同學分享自己的想法后，再進行進一步地討論。

1、研究者如何逾越二十世紀的框架？——地域與人

2015 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70 周年。在東亞，各國政府及市民團體都紛紛組織了相關活動以表達各自的見解。然而在歷史認識問題上卻看不到什麼進展，東亞的對話依舊無法得到統一，甚至還出現了轉變為歐美社會某些地方問題的情況¹。對於歷史認識以及文化多樣性的問題，不僅是政治家與大眾傳媒，甚至連研究者也依舊以國家和民族為主語進行討論，這種作法究竟對問題的解決有多少貢獻？

在此我想舉幾個例子。首先是有關我自身研究的薩哈林島的一個事例。二戰後，曾是日本帝國殖民地的樺太（薩哈林島[或稱庫頁島]南部）被蘇聯占領，當時除了 38 萬日本人，還有殖民地時期由朝鮮半島來的 2.4 萬朝鮮人生活在那裡。二戰後，雖大部分的日本人回到日本，但朝鮮人依然被蘇聯政府滯留在薩哈林，其中一位朝鮮人李炳律曾寫到：

從日本軍國主義壓制中解放出來的朝鮮人為什麼卻被剝奪了回國的權利？即使在惡毒的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時期，至少也有給家鄉寫信的自由。

這樣的矛盾在蘇聯是無法解決的。蘇聯只不過是把我們薩哈林朝鮮人從日本軍國主義的手中奪了過來，這才是最為貼近事實的說法。²

其次第二個例子是有關台灣。台灣在二戰後也從日本帝國主義的壓制中被解放出來，同時國民黨政權和外省人陸續來到台灣。對於這一時期，台灣人蔡焜燦這樣說到：

從大陸來的外省人（中國人）對本省人（台灣人）的歧視和迫害異常嚴重，外省人占據了政府官員和警察等要職，我們本省人不得不甘受“被征服民”的處境。

大街上擠滿了被外省人奪去工作的本省人，大家一邊唉聲嘆氣說“沒有想到會是這樣…”一邊懷念起日治時代。

人們訴苦說：“狗（日本人）去豬（中國人）來。”這個比喻的意思其實是說，狗雖然很吵，

* 京都大學地域研究綜合信息中心助教、京都大學博士（農學）

¹ “Threats, insults and tyres slashed in Strathfield over planned comfort women memorial,”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August 16, 2015

(<http://www.smh.com.au/nsw/threats-insults-and-tyres-slashed-in-strathfield-over-comfort-women-memorial-2015-814-giz7ri.html>)。澳大利亞史卓菲自治市的事例。

² 李炳律『サハリンに生きた朝鮮人』北海道新聞社、2008 年、111-112 頁。

但是知道保護我們，而豬卻只知道貪吃。這種說法在當時的台灣人當中非常盛行。³

由以上的兩例可以看出，在東亞存在著“民族解放”、“國家統一”等以 20 世紀國家為主語產生的概念所不能解釋的歷史經驗。

第三，作為我個人親身經歷的一個事例，我曾於今年夏天在韓國進行過一個有關薩哈林戰後史的學術報告。報告後一位韓國學生對我說：“朝鮮人沒能從薩哈林回國，所以這可以認為是悲劇，但日本人回國了，不應該稱之為悲劇。”但真的能如這位同學所說的嗎？對於當時離開薩哈林的大多日本人來說，薩哈林是他們的故鄉，並且離開時他們的父母被強迫擱置幾乎所有的財產。這位韓國學生的發言讓我感到“民族的悲傷易想像，而個人的悲傷難想像”的問題存在。

人文社會科學原本是為了知曉“人”而出現的學問體系，然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自身卻因國家和民族等 20 世紀的話語建構的界線而失去了對“個人悲傷”的想像力。這種界線時常還會在我腦海中的地圖上浮現。“固有領土”等說法真的存在嗎？除卻宗教信仰的眼光，從理性的角度來分析，地圖上不存在任何“上帝約定給以我們的土地”。當今地圖上的政治界線都是由包括國家間戰爭在內的外交手段所致。

我認為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者應以“地域”和“人”為主語，而不是從“國家”和“民族”出發。只有這樣，才能反省 20 世紀，並逐漸與東亞的其他人在 21 世紀世界觀上產生共鳴。

2. 人文社會科學的最大支援者是不是國家？

2015 年日本政府認為人文社會科學對國家貢獻不大，沒有必要進行支援，因此通過了裁減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規模的方針⁴。對此，我們能做出明確的反駁嗎？換句話說，研究者與國家究竟應該擁有怎樣的關係？

有關研究者和國家的關係，這裡我主要想從日本的情況來進行分析。在日本歷史上，國家權力對學術進行干涉的最具象徵意義的事件是 1933 年發生的瀧川事件。當時的日本政府認為京都大學的自由主義研究者是危險分子，因此對他們進行了鎮壓。二戰後，由於民主化的發展，在日本幾乎看不到政府對研究者個人直接進行鎮壓的事例。比如就今年日本政府提出的國防相關法案（一般叫安保關聯法案），在日本全國出現了大規模的反對運動。作為反對派代表的政治學者，山口二郎教授（日本法政大學）曾在國會議事堂前示威游行時大喊：“我要跟安倍講，你不是人！我要砍死你！我們要用民主主義的方法砍死他，我們要打倒他！”⁵，可是即便這樣山口教授也沒有被日本政府拘留。在當代日本，政府不會直接抑制研究者的言論和研究自由。

今年（2015 年）是湯川朝永宣言 40 周年。湯川秀樹博士和朝永振一郎博士是京都大學最具盛名的物理學家。他們受到尊敬除了因為他們是諾貝爾獎獲得者，還因為他們一直呼籲應該廢除核武器。他們認為 Hiroshima-Nagasaki（對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不僅是一個民族的悲劇，也是全人類共同的悲劇。我認為這一觀點體現的是自然科學者的良心。同樣，作

³ 蔡棍燦『台湾人と日本精神』日本教文社、2000 年、154 頁。

⁴ 「教員養成系など学部廃止を要請 文科相、国立大に」『日本經濟新聞 電子版』2015 年 6 月 8 日発信（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LASDG08HCT_Y5A600C1CR8000/ 最終閲覧：2015 年 11 月 13 日）。

⁵ 「国会前集会発言集（1）「安倍は人間じゃない。たたき斬ってやる」山口二郎法政大教授」『産経ニュース』2015 年 8 月 31 日発信（<http://www.sankei.com/politics/news/150831/pl1508310040-n2.html> 最終閲覧：2015 年 11 月 13 日）。

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也應不斷思考研究者的良心。雖然比起自然科學者，人類社會要顯得更為複雜。

那麼什麼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良心呢？話題回到剛才的安保關聯法案。在有關安保關聯法案的一系列國會討論中，日本國會議員邀請了很多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參加，並採納了他們的意見。其中一部份知識份子在這一過程中，成立了“反對安保關聯法案的學者會”。目前贊同此會的研究者總數已達到 14,236 名⁶，毫無疑問這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言論及行動對日本社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其中一位反對派的憲法學者，同時也是受邀參加國會討論的研究者之一的小林節名譽教授（慶應義塾大學），曾就憲法學者的責任講到：“我們就好像一群不計利害的和尚，在大學這樣一個環境中自由生長，不關心利害。這就像在傳達神學論爭一樣，我們只不過是在解釋條文的客觀意思而已”⁷。從專家的立場對政府推進的法案提出反對意見，我認為這可以稱得上是研究者的良心。

但同時，我們也不應該忘記雖然醫療及部份自然科學領域已通過大學附屬醫院的管理、產學合作、捐款等實現了很大程度的財政獨立，但日本的大學在運營和研究等諸多經費的方面依舊需要依靠政府的支出。面對這種情況，我們是否應該考慮獲得更多來自企業及普通市民的支援呢？即便獲得直接的資金提供比較困難，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的存在意義，能讓更多人有所瞭解的話，立法機關及行政部門也會隨之有更多理解。由此，我認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應該進行更多貼近大眾社會需要及關心的課題研究。

3. 與市民社會應怎樣溝通？

在上文中，我提到了研究者應讓更多普通市民瞭解人文社會科學存在的意義，然而從目前東亞的情況來看，市民社會不一定對研究者抱以寬容態度。這裡我所說的“市民”，不是指等待領導者來領導或知識份子來啟蒙的民眾，而是指認識到自己的義務及權利並主動進行發言和行動的個人。

近來，韓國世宗大學朴裕河教授因出版了慰安婦問題的相關著作受到原慰安婦們的訴訟，此一事件在日本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關注。當自己的研究不得不接受法院的審判時，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應該如何應對⁸？甚至有部份學者在不閱讀此書的情況下就公開表示：“這本書是胡說八道，被提起訴訟也是活該。”⁹對於研究者嘔心瀝血寫出的書是否可以毫無根據地評價為胡說八道？作為研究者應該通過理性分析和驗證的手法才能得出結論。可見“以研究還研究，以言論還言論”這樣研究常識在學術界內外還未被完全瞭解。

日本研究者在二戰後的民主化之前，一直懼怕國家權力的干涉。然而，到了民主化時代，

⁶ 安全保障関連法に反対する学者の会 <http://anti-security-related-bill.jp/> 最終閲覧：2015 年 11 月 13 日）。根據日本教育部公佈的消息，在日本國內所屬大學研究機關的研究者（除了研究員及外聘講師）總數大約為 17 萬名，贊同者數（包括不所屬機關的人、研究員及外聘講師在內）相當於總數的 8%。另外，政治學法學之外專家佔有贊同者的 92% 左右（由 2015 年 6 月 11 日的數據分析得出）。

⁷ 日本国衆議院平和特別委員会 2015 年 6 月 22 日（衆議院インターネット審議中継 <http://www.shugiintv.go.jp/jp/index.php> 最終閲覧：2015 年 11 月 13 日）。

⁸ 日本也出現過同樣的情況。比如「慰安婦問題めぐる西岡氏の著書への損害賠償請求 最高裁が訴え棄却『産経ニュース』2015 年 1 月 15 日発信 <http://www.sankei.com/affairs/news/150115/afr1501150024-n1.html> 最終閲覧：2015 年 11 月 13 日）。

補充一句，這位西岡力東京基督教大學教授多被認為是日本保守派知識分子。

⁹ 例如 2015 年 11 月 5 日京都大學人間環境學研究科小倉紀藏教授為朴裕河教授召開的討論會上，校外的一位韓國教授在表明自己沒有讀過朴裕河此書的情況下，批判朴裕河論著的內容純屬胡謔，完全出於政治目的，而非學術書籍。

卻開始懼怕來自市民社會的壓力而進行自我檢查。比如在目前的日本和韓國等經歷過民主化的國家還存在對持不同價值觀的研究者進行貼標籤的情況，“賣國賊”、“叛國者”、“歷史修正主義者”、“極右分子”、“法西斯分子”等都是常見的標籤。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輿論的壓力，並非來自政府，而是來自媒體及市民社會。對這些拒絕跟自己擁有不同價值觀的人，甚至採取排斥態度的人，我們能做些什麼呢？

2015 年是天皇機關說事件 80 周年。東京帝國大學名譽教授美濃部達吉博士在大正元年（西曆 1912 年）曾提出民主的天皇制學說——“天皇機關說”，並因此被認為是大正民主化的象徵。然而在 20 世紀 30 年代日本國粹主義時勢中美濃部卻最終被壓制。在此，我們應該注意的是，導致美濃部的著作停止發行以及他本人辭去貴族院議員職務的，並非國家，而是當時在議會堂外吆喝美濃部為“學匪”的極右勢力以及想借此提高自身利益的在野黨。

前述的小林教授也曾講到：“憲法保障了修改程序的合法性”¹⁰。這其實與研究有著某種程度的共通之處。研究之所以能稱為研究是因為它可以通過不斷的檢驗證實而最終達到完善。而諸如通過法律、國家規定、政府或市民團體的壓力等將學術本身固定化，使研究者無法進一步對學術內容進行驗證時，這樣的學術就沒法再被稱為學術。持續創造並維護自由議論的平台應該是我們研究者的使命。

此外，作為研究者我認為積極向社會公開自己的研究成果也很重要。舉個例子來說，我最近接受一家報社採訪，不久後採訪的內容就被 Wikipedia（日語版）引用了¹¹。而事實上，被引用的內容是我早在幾年前就已在學術期刊上發表過的。如何拉近學術界與普通社會之間的距離也是研究者需要思考的。

最後，我想簡單地概括一下我的幾個觀點。第一，如果我們不以“國家”和“民族”為中心，而是以“地域”和“人”為主語，能否逾越 20 世紀的框架？第二，市民社會能否成為我們強大的後盾？第三，在與市民社會的關連問題上，作為年輕學者我們應該怎樣確立自己的立場？換句話說上述第二第三點是我們怎樣確保研究自由的問題。

關於我提出的這幾個問題，您不一定需要全部回答。我希望您根據自己的研究事例及研究背景，提出自己的想法和疑問。我認為處在不同研究環境當中的年輕研究者通過交流了解對方的觀點，僅在這一點上就具有積極的意義。謝謝！

¹⁰ 日本国衆議憲法審査会 2015 年 6 月 22 日（衆議院インターネット審議中継
<http://www.shugiintv.go.jp/jp/index.php> 最終閲覧：2015 年 11 月 13 日）。

¹¹ 平出義明「あとき それから サハリン残留 離別望郷翻弄された住民」『朝日新聞』2015 年 8 月 15 日（夕刊・東京版）、第 3 面。「引き揚げ」『Wikipedia（日本語版）』（<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BC%95%E3%81%8D%E6%8F%9A%E3%81%92> 最終閲覧：2015 年 11 月 7 日）。